

## 第一章 日德两国的历史关系

### 1. 日德两国的共同点

池田：回顾过去的历史，日本和德国在许多方面有过共同的经历。因此，我认为就研究所谓“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而言，考察两国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有重大意义。

就日本与德国的交流史而言，时间不算久远；但对近代日本的形成给与最大影响的国家，却是德国。

在日本历史进程中，若概述它从哪些国家，接受了哪些影响的话，我想：在史前时代，恐怕是接受南太平洋各民族的影响，从而奠定了日本民族的基础。在古代，影响当然来自朝鲜半岛诸国和中国。从衣食住等基本文化到文字、宗教、道德观，从城市布局到国家机构，在进入古代以来的一千几百年，日本不断地向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各国学习，奠定了日本文明的基础。

自16世纪首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到日本后，欧洲文明的影响才波及日本。他们带来了称之为“迪雅曼”的玻璃器皿、火绳枪、烟草等嗜好品，还有南瓜等食用植物以及点心等。天主教信仰也进入了日本。但是，到德川时代，由于幕府采取锁国政策，只允许与中国和荷兰通

商，外贸港口仅限于长崎一地。

至德川时代末期（1853年6月）美国派遣培理提督<sup>①</sup>来日本，在其强硬要求下，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其后，随着国内分裂、对抗的激化，一派势力与英国相联合，另一派势力则投靠法国。对抗双方凭借手中的现代武器，互竞雄长。结果，德川幕府还政于朝廷，1868年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治政府在建立足以与欧美列强对抗的现代国家时，围绕以哪个国为模式的问题，进行了各种探讨。1871年，日本决定以刚刚成立的普鲁士为盟主的德意志帝国为效仿的典范。

明治政府的实权派伊藤博文（1841—1909）曾亲自赴德国，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范本，在1889年制定了宪法。勿庸赘言，从议会、内阁、司法机关、官僚机构到教育机构，全都效仿当时的德国。司法、医学等各门学问，也皆以德国为师。明治、大正以至昭和初期，官费留学生几乎都是赴德国留学。

狄尔鲍拉夫：的确，日本向国际社会敞开国门时，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日本从德国输入大量的文物制度，如宪法的范本、近代军队组织和警察机构等。日本的大学招聘德国的大学教师，德国的建筑师亲自设计东京的主要公共建筑。

在回顾历史过程的同时，若划分出西方关注日本的几个时期来观察，我想会更加明了日德两国的关系。

在 15、16 世纪，中欧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以第三国为中间媒介。当时，尤其是在欧洲王公贵族阶级中间，多把中国和日本看成是装饰城堡厅馆并使之具有异国情调的一种“骨董陈列室”。其后不久，通过旅游热和对未知之国的兴趣，架起了第二座桥梁。这期间，远东的中国和日本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从那时的游记来看，一部分属于传闻式的记述，另一部分则产生于史书式的记载，是极其认真地加以领会后的记述。传闻式的描写大都带有文明批判的倾向，例如阿尔江侯爵<sup>②</sup>和奥里夫·哥尔德斯密斯<sup>③</sup>的《中国人信札》（也译作《世界公民》——译者注）使人想起孟德斯鸠<sup>④</sup>的著作《波斯人信札》。《中国人信札》以一个在欧洲旅行的中国人的口吻，指责欧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依据当时启蒙主义的观念，把远东描写得十分理想化。中国和日本成了令欧洲人自叹弗如的国度。或者有时竟从反方向描述欧洲弊病，以构成鲜明的对照。

恩格尔白尔特·肯白尔<sup>⑤</sup>在最早问世的《江户见闻记》中嘲笑荷兰人谒见将军的场面如同“耍猴”表演。正如您所说，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在长崎设立了商馆。那是以屈辱让步为代价，从而获得了幕府当局设馆的允许。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为维护其信仰，在 1637—1638 年举行起义，即“岛原之乱”，但以惨败而告终。

在最早一批有过赴日经历的人当中，有个名声不佳的毛里茨·比奥尼奥夫斯基男爵<sup>⑥</sup>。他自称起初曾担任过玛利亚·苔来姬阿女王<sup>⑦</sup>的公使，后来得知自己是波

兰人，于是逃亡堪察加半岛。这是他编造的超级谎言，使日本感到相当不快。科采布<sup>⑧</sup>在其作品《堪察加的叛乱》中，记述了这个奇怪的人物。我想，比奥尼奥夫斯基男爵写给驻长崎荷兰商馆馆长的信，也许是日本人最早见到的德语书简。

来日本的欧美人士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菲利普·弗兰茨·希波尔德<sup>⑨</sup>、德国商人奥古斯特·留道尔夫<sup>⑩</sup>、与培理舰队同行的优秀测绘画家威鲁海尔姆·海奈<sup>⑪</sup>等。由于他们的体验具体而生动，因而对日本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介绍。希波尔德与在地理、地形学领域以伟大先驱者著称的德国学者卡尔·李达<sup>⑫</sup>、亚历山大·冯·芬伯特<sup>⑬</sup>等密切合作，致力于研究日本的地形。这些研究日本的著作图书价格很高，但欧洲人却纷纷购买。歌德<sup>⑭</sup>作为东方文化热的先驱，撰写出了《东西方诗集》（1819年刊）。

池田：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德国只是在学术或文化上，对亚洲及其他的文明怀有广泛而强烈的好奇心。当然自18世纪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构成整个欧洲的时代主流，其主导思想是普遍的人类文明观念，对异国文化满怀有一种憧憬。即使如此，对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来说，很难直接接触中国和日本的文物古迹。

狄尔鲍拉夫：当然，在无法与日本直接接触时期，从事研究相当困难。例如维也纳的日本研究者奥古斯

特·波弗茨麦阿<sup>®</sup>为了搞到研究资料，不得不委托在荷兰（莱顿大学）编著过实用日语语法书并担任日本讲座的生于维尔茨堡的约翰·约瑟夫·霍夫曼（1805—1878）从荷兰函购资料。

除上述文学研究外，许久以前，欧洲与日本曾建立过通商关系。对欧洲来说，远东的两个大国，即中国和日本，首先是贵金属和香料的提供者。到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果的 19 世纪后半期，两国被欧洲视为广阔的商品市场。欧美国家随即开始一连串的尝试，以便把日本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中解脱出来，使之加入国际贸易体系。首创其功者，即您提到的美国培理提督，他在 1854 年第二次访问日本时，利用威胁手段迫使日本门户开放，这一行动通过通商条约的签订而合法化。接着，英国、俄国、荷兰、法国接连与日本订立内容相同的条约，不久，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成为对日缔约国。

前面提到的留道尔夫展开外交活动，试图让幕府承认德意志也拥有与美、英、俄国相同的权利，但未获成功。于是，普鲁士转而指望奥地利保护“在遥远海域的德意志的利益、德意志的贸易和德意志的权利”。但由于奥地利在意大利和德国战场受挫，外交政策失误，结果陷入被普鲁士抢先的窘境。这样一来，普鲁士于 1861 年、瑞士于 1864 年分别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1869 年奥地利为与日本缔约而采取行动，日德、日瑞条约反倒成为奥地利与明治政府缔约的有利条件。

这样，就具备了您所说的多种文化联系的所有前提

条件。德国的医学和啤酒酿造法等专门技术遐迩闻名，因而引起日本的注意；奥地利则以传统音乐风靡了日本。我想，下述的事情不太为人们所熟知：据说，当时曾通过外交途径邀请约翰·施特劳斯<sup>®</sup>来日本，但是他却婉言谢绝了。后改由鲁道夫·台德里希<sup>®</sup>担任东京音乐学校的教师，工作得相当活跃。

池田：日本自明治以来走上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协约国阵营，与德国兵戎相见。当德国战败后建立魏玛共和国体制时，日本的大正民主之花正盛开怒放。在德国，当纳粹把持政权并逐步走向极权道路时，在日本，军部也掌握了政权。两国共同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惨败为止，两国亦步亦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日本的榜样。在一定的时期里，日本对美一边倒，后来逐渐变为多边化。到今天，随着对英、法、德、意大利等国的研究和好感的加深，日本人憧憬的国度也形形色色。

狄尔鲍拉夫：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作为其背景，乃是为了对抗俄国的领土扩张政策，以形成与英国建立同盟的政治态势。但即使在存有政治隔阂的时期，德国与日本悠久的文化关系也未断绝。据某报告报导：日本占领德国于 1898 年租借的青岛后，将俘获的 5000 名德国战俘押往四国监禁。在那里，战俘

举行了乐团演奏。第一次听到管弦乐演奏的日本人大受感动，他们竞相模仿，德国式的管弦乐队演奏一时颇为流行。与此相反，1940年日本之所以加入德、意轴心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于日本在政治上存在着与德国类似的意识形态和军国主义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与德国一同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我在此虽无意深究战后日本喜好并接近欧洲的哪一个国家，但我认为，无法抹煞德国的深刻影响。例如在法律方面，我倒有一番个人的感受。阿尔弗莱特·奥普勒<sup>⑮</sup>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的老朋友，起初他当过德国司法机构惩戒处分局的副局长，由于他是犹太人，后来移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在麦克阿瑟<sup>⑯</sup>的参谋部供职。日本之所以招聘他，是急需德国法学家的专业知识以便顺利实施日本国宪法的修改。奥普勒在“盟总”等单位工作了15年，其间，协助麦克阿瑟完成了不少棘手的任务。他写过一本自传，书名为《三种人生》分别描述了他最初作为有声望的德国法律家，其后成为陷入绝望孤立状况的移民，最后成为麦克阿瑟得力顾问的三历其变的前半生。他的自传反映了纳粹时代某些德国人的典型命运，同时也轮廓分明地勾勒出了德国与日本密切的文化关系。

池田：面对欧美诸国，日本尤其以德国为榜样，推行现代化；日德两国经历过如此相同的命运，在上述事实的根底中，存在着两国国民性格与思考方式的相同之处。

关于这个问题，教授怎样分析？我认为，考察这一问题对研讨现代化的过程和成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德国人和日本人特别相信集体的力量。当然，这种信仰不分哪种民族，已得到全体人类的认同。您以为如何？

狄尔鲍拉夫：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德意志民族往往以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现出集体倾向。典型的事例是被人挖苦为所谓德国式的“集体嗜好”。此外还可以举出德日两国人相同的性格：勤奋、有才能、工作时如醉如痴的劳动热情、狂信式的锲而不舍精神、明显的传统意识等，再就是极易陷入政治上的教条主义。

池田：如您所说，我认为勤奋、有才能、劳动意识等是两国国民相同的性格。然而，较之其他各民族，无宁说日本人的锲而不舍精神、传统意识和政治上的教条主义等是相对薄弱的。例如，在战后的德国，至今仍继续追查纳粹战犯。但在日本，盟军占领时代被剥夺公职者，一俟解除占领，则立即恢复了公职，公开露面。

## 2. 劳动的伦理

池田：在日本人与德国人的相同之处中最突出的一点即其勤奋精神，这也可以称之为对本职工作的认真精神。因此我本人虽访问过许多国家，但在旅途逗留中，

最令人放心的是德国人。例如，在严守约定时间方面，德国人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在各种生产活动中，这种勤奋精神和准确性体现为产品质量的精良，构成了支撑两国经济繁荣的基础。

为避免误解，在这里自然应预先说明：我并非只相信德国人而不相信英国人或法国人，也不是说后者不勤奋。无论在任何国家，许多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职业充满自豪，并向社会提供值得称赞的产品。

德国人勤奋精神的基础是什么？尤其是人们常说的宗教观念支撑下的德国人的劳动观已发生巨大变化，简直是今非昔比。那么，将来如何变化？狄尔鲍拉夫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狄尔鲍拉夫：我始终认为，严守时间是日本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一般说来，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信赖的，却未必达到日本人严守时间的程度。至于工作的勤奋性，或许可以说两国国民相差无几。

为理解欧洲民族对待工作的各种态度及德国人常说的“狂热的劳动意识”，我认为有必要追溯自古以来的精神源泉，即古希腊时代和基督教。

众所周知，古代市民的城邦国家文化是建立在劳动应由奴隶去从事的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从事劳动的也有平民工匠、商人或事业家。较之单纯为了生存下去的实利性劳动，统治阶级更重视利用必要的时间，去从事文学、哲学、政治等高尚的精神活动，结果反倒使这些统治阶级

成为欧洲文化传统的创立者。

《旧约全书》对劳动持否定看法，视之为被赶出伊甸园的人终生无法摆脱的“报应”。被驱逐到大地上的人此后不得不为谋生而汗流浹背地劳动。保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话，反映出生存的欲望与必须尽劳动义务是表里互为一体的。

但是在基督教徒的日常生活中，实际具有“报应”性质的劳动，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如受制于某种环境，或者罪犯被迫劳动，在这种场合下，劳动才真正地成为痛苦的事情。单独来看，即使在气候比较稳定，社会制度不同的中欧，也存在“繁重的劳动”，但原则上并不存在“劳动悲惨”或“劳动是一种苦难”等现象。因而欧洲人对满足自身欲望的劳动，总是表现出积极姿态，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之前的近代世界的特征。这里掺进了宗教的色彩。中世纪的手工业、商业规则带有基督教气息。时至今日，在“日常劳动”和“下班”（停止工作）的用语区别中，仍能看到其痕迹。德语的“下班”*Feierabend* 中的“*feiern*”意为庆祝、休息，原本含有履行宗教习惯的意思。

池田：在上述勤奋精神的背后，我想可以考虑到下述种种重要因素，如宗教信仰与工作精神的结合、自然环境与共同体社会的结构等等。譬如，自马克斯·韦伯<sup>②</sup>以来，像人们所经常指出的那样：在新教伦理中，劳动本身被视为对上帝的奉献，因此，不论他人是在与不在，都能经得起上帝审视，培养出认真工作的精神。

在日本，传统的行业各自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即使在现代化的企业中，也能看到在车间或办公大楼的屋顶供奉神祇的事例。这些事例也可以说是劳动精神与宗教信仰的结合，不过大都已形式化。

就自然环境方面而言，本来在自然条件相对严酷的情况下，需要特别付出努力和发挥创造性，从而自然而然地养成勤奋精神。这与自然条件优越、无须耕地施肥也能获得大丰收的地区，当然会形成不同的生存方式。

在社会构成或社会状态方面，存在着整个社会以勤奋为美德与不是在劳动中而是在享乐中追求人生意义等社会风气的差异。另外，不劳动则无法生存与不劳动却因社会保障制度完备而能够生存的社会之间，当然也会造成人们勤奋程度的差异。

狄尔鲍拉夫：就像日本的手工业，各行业各有其守护神一样，在德国，每个行业也都列有其相应的圣者，至今仍习惯于一年举行一次庆典或庆祝活动。

这种基督教式的工作态度（时代精神）也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成熟而世俗化了。世俗化的基督教，在今天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意识”中仍旧余韵犹存。关于这一点，则正如池田先生所说，马克斯·韦伯追溯到了“内心的禁欲”这一加尔文主义的原理。对加尔文派的信徒们来说，为生产而正当地使用财富，不仅是人生创造性的使命，而且是对上帝表示虔诚的一种行为。然而，先前的满足欲望型经济改变为以生产、投资、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的经济，这样便

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可行性经济，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和紧张状态。出于业绩优先的想法，当然首先不被重视的是担负劳动的人，工人被降格为成本计算中的单纯经济数字。

作为工业化初期的经验，为反对加尔文主义企业家意识，产生了马克思所确定的工人意识形态，这并非不可思议。

在前近代世界的工商业活动中，车间宽敞，人际关系是个人式的 另外 其优点是 劳动成果具体 并能自我满足。

但是，新的工业组织强制工人一律去从事台奥德阿·里特<sup>②</sup>所说的“盲目的工作”。工人们总是站在传送带前，反复进行被限制在相当狭窄范围内的同一作业，感受不到产品成形的心满意足，与其他同事也没有人际间的接触。在这里表现出了单纯劳动的盲目性。

马克思把这种工业劳动组织的恶劣影响归纳为三疏远 即人与产品疏远 与同事疏远 最终是与自身疏远。因此 马克思反对加尔文派的“虔诚的”资本主义 提倡不仅应抛弃经济的私有财产，而且也应抛弃社会性的阶级差别。

池田：的确，在思考人们的心理时，“有出息者”与“无出息者”这两者的差别本身并不令人愉快 但“无出息者”经过努力 有希望成为“有出息者”那么就会更加努力。而这种希望破灭，劳动欲望也就会消失。

狄尔鲍拉夫：我认为，劳动道德和劳动热情决非固定不变的定数，而是适应某种状况的变数，它按照新情况而改变其形态。因此，西方各国自由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带有积极的色彩，并被凝缩在一种业绩主义观念中。在德国不少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外籍工人，他们来自物产丰富、无须拼命劳动也过得下去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国度。他们时常念叨的口头禅是“游手好闲 及时行乐”，但他们一旦被吸收进工业生产过程，便立即遵循严格的劳务规定。

池田：的确如此。可以说热情或努力并非取决于先天，而是取决于所处的环境状况。如果能付出多少努力，就有多少报酬，如果能树立因努力而成果斐然的先例，就会给人们以很大激励，从而增进全体成员的热情和努力。因此，断言某民族、某人种先天懒惰或先天勤奋都是错误的。

狄尔鲍拉夫：任何劳动道德均取决于环境状况。作为其一个例证，西方工业国家几乎都经历过由完全雇佣经济向景气型或结构型的危机经济变迁。·在社会福利国家取得成果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力的 60、70 年代 德国人的劳动道德也相当马马虎虎，所谓“泡病假”的现象也未被认真追究，然而，这种马马虎虎却随着失业者人数的增加而迅速消灭，因为谁也不想失掉饭碗。另外，这不仅仅是出于维持生活水平的考虑，也是由于从职务中发

现了一种人生的意义。为此人们不惜作出牺牲，有的甚至去从事低于自身教育水平的工作。

尽管如此，德国工人并不因缩短工作时间而感到为难。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嗜好而充分享用自由时间。那种认为德国工人靠缩短劳动时间来消除失业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当然，失去职业训练或就业的可能性，丢掉职业或经常处于短期或长期的失业状态，对被剥夺参加社会生活机会的青年，对拼命工作的中年人和对身体尚健壮因而不想被人看成是废铁烂钢的老工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

上述情况给人的启示是：随着失业的增加，劳动将被人们所肯定。人们心甘情愿地努力献身于工作，将劳动再次视为有价值的社会与文化财产。

当然，在遥远的未来，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但我认为，在社会结构上，已不可能恢复劳动者全部被雇佣的状态，与此相关，高失业率的状态似乎将持续下去。面对这种状况，修改社会效率标准的必要性也将随之而产生。也就是说，正如达尼埃尔·白鲁<sup>⑥</sup>提倡的那样：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生活方式里，特有的快乐主义的标准将取而代之。不过，这恐怕只是单纯的心理学上的修补。经济上生产率得以维持，没有得到劳动实惠的人们即使生活有了保障，结果业绩优先的标准仍无任何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的情况如何？

池田：就我们同时代的人而言，至少可以说，只有

少数日本人把无须劳动而生活看成是一种福气，但大多数人都把它视之为痛苦。然而在年青一代当中，将无须劳动也可生活视为庆幸的人正在增加，这种人在将来会越来越多。因此，享乐之风会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生产自动化、机器人从事劳动、多数人无须劳作、把精力放在追求享乐的时代或许会到来。但是，我认为许多人会在这种生活中感到空虚，从而重新回到人自身参加劳动的道路上来。

### 3. 教育与科学

池田：如上所述，日本在从事现代化建设时，曾以德国为最理想的榜样，就连国家体制也效仿德国。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接受德国的影响最大。

1877年（明治10年）东京大学创立之时，4名德籍教师来到日本，讲授医学、金石学、地质学和采矿学。1886年（明治19年）公布的《帝国大学令》以普鲁士的大学令为范本，它成为以后日本教育机构的基础。

另一方面，大量青年为掌握科学，被派遣到欧洲去留学。作为1870年第一期留学生前往德国的长井长义博士<sup>②</sup>，师从柏林大学的霍夫曼教授<sup>③</sup>，旅居德国13年，归国后在东京大学毕业生从事研究与教学，他被称为日本的药学之父。

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德国物理学家W·海塞博尔格（1901—1976）在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学研究所，与仁

科芳雄博士<sup>⑤</sup>共同从事研究。在仁科博士指导下，汤川秀树<sup>⑥</sup>等优秀物理学家人材辈出。因此仁科博士被称作日本的物理学之父。其他，还有植物学的木原均博士<sup>⑦</sup>，以及北里柴三郎博士<sup>⑧</sup>、志贺洁博士<sup>⑨</sup>、秦佐八郎博士<sup>⑩</sup>等大批优秀人物，无不深受德国学术培育之恩，取得研究成果，并为日本学术的蓬勃发展做出了贡献。

· 回顾上述大量事例时，不禁使人感慨万分，日本得益于德国者是何其多啊。

狄尔鲍拉夫：自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来，日德两国的文化交流逐步加强。从那时起，感情上的相互理解发挥了伟大的作用。

您在谈话中指出下列事实：德籍教师被日本大学聘用，而大量日本留学生则为振兴本国的学术，前往德国。在这些人当中，请允许我补充有关青木周藏（1844—1914）的事迹。青木身为公使，被派驻柏林，后来荣任外务大臣。1869 年他首先以留学生身份前往柏林，娶德国姑娘艾丽莎白·冯·拉盖<sup>⑪</sup>为妻，此后便与德国结下不解之缘。另外，还有医生兼小说家森鸥外<sup>⑫</sup>、哲学家井上哲次郎<sup>⑬</sup>等。1884 年至 1890 年，井上在柏林担任东方学系的日语讲师。当时他还在维也纳、布拉格、苏黎世等处讲授日语。此外，玉井喜作<sup>⑭</sup>在 1898 年发行杂志《东亚》，该杂志的副题是“旅居欧洲日本人的首家月刊杂志”。

池田：森鸥外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发表了取材

于留德生活的文学作品，激发日本青年对德国的向往。另一方面，与森鸥外并称为文豪的夏目漱石<sup>④</sup>留学英国，通过取材于旅英生活的文学作品，唤起人们对英国的憧憬。森鸥外和夏目漱石虽未直接对科技的自身发展发挥作用，但通过上述文学作品，使人们对欧洲文化感到亲切，通过激发青年人的热情，间接地为科学的振兴做出了贡献。

狄尔鲍拉夫：日本学生愿意就读德国大学的原因，似乎可以从历史的联系中得到说明。德国的大学改革开始于 19 世纪初期，首先倡导并最具影响力的是兼有外交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威尔海姆·冯·芬伯特<sup>⑤</sup>。到 18 世纪为止，德国的大学多具有技术性的职业专门学校的性质，于是针对这种状况而着手改革。指导改革的新的教育观念，是以哲学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取得各个专科的研究成果。

芬伯特率先垂范。他本人深感兴趣的学科是语言研究，这样便将语言与哲学相结合。另外，列奥波尔德·冯·兰克(1795—1886)以及当时伟大的历史学家们，借助芬伯特与黑格尔<sup>⑥</sup>的洞察力，形成了崭新的历史研究。奥古斯特·威尔海姆·冯·修莱盖尔(1767—1845)，是最早的一位东方学家，他全面收集有关柏林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使之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并使其结出丰硕的成果。

在地理学方面，亚历山大·冯·芬伯特及其学生